

关注

众所周知,每年的一二月份都是美国金球奖和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的时候,一批具有较高艺术水准又不乏趣味性的电影,集中涌入人们的视野。于是从去年开始,三四月份的全国院线开始有意识、有选择的将这些高质量艺术电影推送到大众眼前,让国内观众得以在大银幕上欣赏这些佳作。如果说传统的暑期档、贺岁档仍然是各类大片角逐的战场,那么艺术电影已经悄悄在三四月份于院线撬开了一个口子,电影的艺术价值和与之而来的话题讨论成为春季档的显著标识。

观众对艺术电影的态度发生变化

去年奥斯卡两部口碑大热的作品《水形物语》和《三块广告牌》都在3月先后引入国内院线,其中奥斯卡最佳影片新贵《水形物语》更是斩下了过亿票房。如果没有《黑豹》和《头号玩家》的前后夹击,相信这两部影片的市场表现还能更加出色。这一次艺术电影的牛刀小试,试出了国内观众对于电影艺术价值的期盼程度和接受能力,事实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国产艺术电影从业者的信心和热情。这一点,从今年与去年国产艺术电影上映数量的对比就能看出。去年春季档,几乎没有有什么拿的出手的国产电影亮相,而今年,好作品让人目不暇接。

一方面艺术电影运作机构还在揣摩观众的穴位,另一方面,观众对于艺术的审美能力也在不断变化、提高,这种你追我赶的架势正在为艺术电影延宕出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上面说到的两部艺术电影在去年引进时还有些试探的架势——《水形物语》结合了大量的视觉效果,而《三块广告牌》则披着追凶的类型外衣——引进方生怕商业元素的过分挤压会刺激到院线的票房神经。有了去年的经验,今年引进方的胆子似乎大了许多,奥斯卡最佳影片《绿皮书》几乎不具备任何商业卖点,却在国内收获了超过4亿票房;另一部音乐传记片《波西米亚狂想曲》则将受众做了更为细致的区分,精准点燃了摇滚乐迷们的热情。国产艺术电影也在这时群贤毕至,合力为三四月间的国内影市贡献了一道亮丽的文艺风景线。

客观来看,观众对于艺术电影接受能力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源于“90后”对票仓的接管。拥有多元价值观的年轻人开始大量走入影院,成为观影的主力人群。与“60后”、“70后”相比,“80后”、“90后”普遍接受了更为系统的高等教育。艺术鉴赏能力不再只是从属于专业人群,而是逐渐渗透到更广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



一种基本的学习能力。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商业电影传达的相对简单的二元思维,转而尝试着向更为复杂、深邃的人性解析迈开脚步。

春季档艺术电影的得与失

今年年初,一部叫做《四个春天》的纪录片悄悄上映,并随即引起了轰动,这部影片的导演陆庆屹并非专业出身,他拍摄的对象就是自己的父亲母亲。电影通过极度简练的手法和粗粝的色调记录了4年时间里,两位老人的生活片段以及故乡小镇方方面面的细微变化。本片情感真挚、观察细腻,选择在过年回家前的时段上映,瞬间勾起了游子们的思乡情绪,以区区不到万元的成本,搏回了千万票房,成为2019年中国影市创造的第一个奇迹。一个季度过去,该片仍在某专业电影公号制作的年度院线电影评分榜上高居首位。低成本、小制作仍然是艺术电影

艺术电影国内市场的春天

□任凡

最为普遍的特征。但其实艺术电影最为核心的部分除了对于艺术形式的探索,主要还在于对人类细微情感的捕捉和表达。但是这种表达需要足够真诚,并且尽量以凝练的语调和大众建立关联,避免喃喃自语式的孤芳自赏。《四个春天》出色地完成了以上这些,为2019年的艺术电影打出一个开门红。

进入3月以后,国内外艺术电影齐聚院线,它们各自讲述着对生活别样而生动的理解,尝试着触碰观众内心深处更为隐秘的部分,极大的满足了挑剔的观众日益多元化的审美需求。《绿皮书》讲述的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种族隔离时期发生的一段真实的故事。纽约天才黑人音乐家谢利计划到南方巡演,但南方保守的政治空气导致种族主义仍然肆虐。谢利雇佣了白人司机托尼与他同行,以便帮助他应对一些可以预见的麻烦。托尼原本是个看场子的小混混,迫于生计接受了这份工作。两人无论在肤色、性格还是受教育程度上,都有着天壤之别,但在一路同行的过程中,彼此的价值观却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对方。最终,两人顺利完成了巡演,更重要的是,在内心深处,他们拥抱了彼此,同时也为自己打开了一扇门,并由此通往自己原本不熟悉甚至排斥的另一个世界。

相比《绿皮书》的口碑票房双赢,由青年导演白雪执导的处女作《过春天》在票房上显然没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但是,这部不靠流量明星,全部启用新人担纲主演的作品,却为国产青春电影奉献出了一次最具诚意的表达。电影聚焦深港两地,从一个“单非”少女的视角入手,还原一段充满了叛逆和惊险的青春物语。少女佩佩和单亲妈妈生活在深圳,同时在香港读高中。一个偶然的机会,佩佩发现自己的“单非”身份可以方便的帮助穿梭于粤港两地的苹果手机商人带货。从一开始的谨小慎微,到后来的轻车熟路,佩佩俨然成了一名经验丰富的“水客”。眼看钱就要攒够,日本之旅就要梦想成真,一次危险的尝试却让她连本代利付出了成长的代价。《过春天》果断抛弃了青春片惯用的套路,剔除了那些失真的情感冲突,专注于呈现佩佩不经

意间步入危险后的思想和情感变化,克制而朦胧的表达尽显出更具现实感的张力。本片入围了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单元,还在去年拿下了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穆蓉荣誉奖的最佳影片,一系列奖项的背后正是影片获得卓越口碑的有力支撑。

兼顾电影的艺术性和市场表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即便有了明星助阵,也难免遭受冷遇。与《过春天》同一天上映的《阳台上》尴尬的票房成绩就说明了这一问题。这部由张猛执导,吸引了周冬雨投资并参演的影片讲述的也是一个关于青春和成长的故事。主人公少年张英雄由于父亲意外去世迁怒于拆迁办工作人员陆志强,一直伺机报复。当迷恋上陆志强的智障女儿后,他纠结的情感变得更加无处安放。在同事红毛沈重的影响下,张英雄展开了一场尤利西斯式的精神流浪并在影片的结尾回归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心结。本片文艺气质相当浓重,大量使用抖动的面部特写与主人公内心世界构成呼应,烟不离手却姿势笨拙隐喻了张英雄急于进入成人世界而找不到入口的焦虑。但是,本片在表达上的过于写意,导致了整体叙事的碎片化,也无奈地拉开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地久天长》和《波西米亚狂想曲》是两部史诗级的艺术电影。前者通过讲述一个失独家庭摆脱心理阴影的挣扎,勾连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给国人生活带来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造成的感动与阵痛。后者以英国皇后乐队主唱弗雷迪·默库里为主角,讲述了一段音乐史上的传奇。在弗莱迪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音乐与生命两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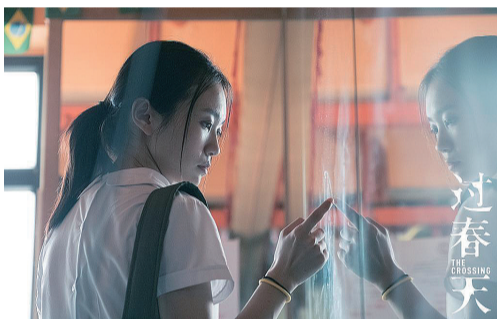


舞台既相互羁绊又相互成全,最终在肆意挥洒的激情里迎来了片尾那20分钟高光时刻。两部电影对角色的塑造都做到了匠心独运,细腻的演绎为前者拿下了本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男女演员,也为后者一举摘下本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桂冠。

艺术电影路在脚下

艺术电影在3月院线集中绽放,而4月还有姜文导演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和中日合拍的《在乎你》等优秀作品陆续上映。随着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也将在近期拉开帷幕,电影市场这股文艺热风还有持续蔓延的势头。

近两年,随着平遥国际电影展、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等专注于艺术电影传播的电影活动走向成熟,以及民间放映团体的有序增长,艺术电影正在逐步找到其生存方式和方向,并培养起自己的受众群体。可以说,艺术电影正在国内开启一个从未有过的黄金时代。北京、上海等重量级电影节开票时的一抢而空,电影资料馆放映经典影片时一票难求,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艺术电影市场正在张开双臂。而有序组织艺术院线,有针对性的吸纳和制作高质量的影片,也正在艺术电影和观众之间切切实实的搭起一座桥梁。艺术电影的质量和观众的欣赏水平之间正在建立起相互培养、共同进步的良好机制。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在建立差异化影院放映的呼声中,在全体从业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艺术电影的将来是值得期待的。



新作点评



听说靠养鸡、养猪、养牛、养羊致富的,真没听说过养驴致富的。电影《耿二驴那些事儿》就跟养驴较劲了。

现实主义乡土叙事喜剧电影《耿二驴那些事儿》,将镜头锁定“精准扶贫”主题,围绕村民耿二驴竞选当上村主任后,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坚持靠养驴脱贫的信念,成立养驴合作社让农民变成股东的故事。影片中坐落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的典型村庄院落,浓郁的山西地方特色色化道,角色人物幽默诙谐的语言,包括演员肢体语言的艺术塑造,为观众呈现了原汁原味当下“山药蛋”农民的质朴气息和他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

中国乡土题材电影历来具有强烈文学意味,而在表现乡土生活形式上,既有以山西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原汁原味的朴实,也有冀中平原“荷花淀派”的浪漫主义气息与乐观情怀。《耿二驴那些事儿》散发着浓厚的“山药蛋派”文学气息。从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到马烽的《吕梁英雄传》,“山药蛋派”文学除了从叙事风格上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和说唱艺术传统,语言朴实精练、通俗易懂外,其中一个最为鲜明的艺术风格就在于对农民本体塑造的仰角模式,即通过农民本体的价值观、审美观来叙事,加上幽默诙谐的农村生活化语言,受到普通大众喜爱。

一部具备文学气质的电影作品要有文眼,该片的文眼就是驴,人物角色性格塑造、情节设置、矛盾的铺展展开都紧紧围绕着“驴”而展开,村主任有股犟驴劲,外号耿二驴,村民讨债靠驴叫,村民致富靠养驴,就连男女主人公相爱也因为驴而结缘,驴在该片中不仅成为精准扶贫的核心元素,同时在塑造不同人物性格上有了拟人化的视角。这种拟人化与传统中国画讲究写意性的“知黑留

散发着浓厚的「山药蛋派」文学气息

电影《耿二驴那些事儿》观后感

□高小立

白”“托物言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电影《耿二驴那些事儿》的主题立意是“定点扶贫 精准扶贫”,在同类影视作品下,大多通过政策引导、领导支持这种自上而下的叙事模式,再辅以诸如大学生村官、扶贫干部、农业专家这些代表先进思想观念的导入,双管齐下来展开对扶贫工作具体情节、矛盾的叙事。其实这背后,有时容易导致“二元文明”并行下,作为后工业文明代表的主创在描述农业文明时不自觉的思想意识上的优越感。回顾改革开放初期,恰恰是小岗村村民自发按手印,自下而上要求包产到户。可以肯定,没有谁比农民更加懂得他们世代代生活的土地。

村主任耿二驴知道,乡里扶贫款是用来种樱桃树的,尽管他不懂得土壤适不适合,但是前几年在老村长带领下种树都失败了,他反而通过自家养驴,发现这是当地摘掉村民贫困帽子最好的方式。但是,分散养驴形不成规模化就难以实现规模效益,打过了见过世面的耿二驴明白这点。从戏剧冲突角度看,乡长和老村长坚持用扶贫款种樱桃树,耿二驴坚持发展养驴合作社,其出发点都是好的,不是黑白对立的矛盾,而是在国家的扶贫政策下如何与地方、乡村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这点上,耿二驴的犟驴性格恰恰反映了他敢说真话,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为村民脱贫的人物闪光点。同时,周边乡村发展果树产业的成果、落果又能成为养驴产业经济实惠的高品质饲料,又体现了耿二驴作为中国农民聪明智慧的一面。该片最大的艺术特点在于将“精准扶贫”的焦点放在以耿二驴为代表的农民本体进行主线叙述,致富决策者不是大学生村官,不是进城致富后反哺农村的成功商人,而是表面上又“二”又“驴”实际很有智慧的耿二驴,影片镜头也没有花费在开会、动员上,全部用在了耿二驴要养驴的执拗上,片中乡长、蹲点女大学生、老村长都作为副线叙述,使影片的叙事推进真实不跑偏。

该片还将极富民族特色的山西戏曲艺术融入进来,尤其是山西的农民,耕作之余,吼两嗓子郭沫若称赞的“激昂慷慨不寻常”的山西梆子,是他们祖祖辈辈烙在心里的民族基因。《窦娥冤》《西厢记》《赵氏孤儿》《杨家将》等,是这些质朴农民对于家国情怀、民族大义、伦理道德、善恶明辨的一种胜于文字的文脉相传。片尾在耿二驴婚礼上,新娘载歌载舞的山西小调透着那股烟火气,将全部推向欢快的高潮。当然,如果剧中的戏曲元素能更好的和剧情交织起来,或许可成为一部为中国乡土题材电影拓展艺术表现道路的典范。

中国电影既需要《流浪地球》这样迈入重工业的鸿篇巨制,也需要极具人文色彩接地气的现实主义之作。

一家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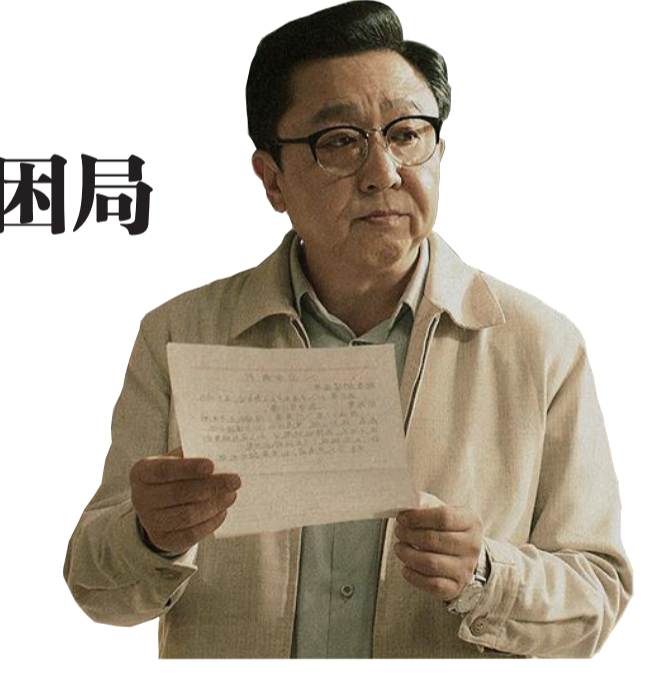
《老师·好》：青春怀旧片的困局

□郑 炆

以“问题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对抗为主线,同时表现老师对学生们的指引与救赎的影片并不鲜见,在国外曾有标杆之作《放牛班的春天》,近期还有一部引起较大反响的印度影片《嗶嗶老师》。但拥有这样的主线或主旨并非它们是它们成为范本的根本原因,而是在于合乎创作规律与在地特征的类型嫁接:《放牛班的春天》将音乐片的类型套入主题之中,而《嗶嗶老师》则充满了浓重的印度现实主义题材特色。近期由张栾执导的国产电影《老师·好》也是这样一部充满“野心”的嫁接之作,因为其外化于青春片而顺势带出的伤感与怀旧情结是显见的。遗憾的是,由于片中诸如绝症、车祸等“狗血”情节的运用,使这部本应聚焦于师生关系与学生成长的影片内核遭到了些许稀释。

虽说如此,此种意义上的“青春片”还是与前些年充斥中国银幕的校园题材青春片存在着较大差异。其中最为鲜明的就是这种高调的怀旧主体从上世纪80年代的学生转向了教师,于谦饰演的苗老师——一位在2019年的当今实际年龄大约75岁的男性——成为了本片的第一主人公。并且,通过这种主体的让渡,使跨越代际的怀旧情绪为片中青年们的少不更事与青春懵懂平添了一种规训的力量,因为它不仅塑造出从未存在于当下“95后”真实记忆与社会体验中的青春时期的父辈形象,还把抑制青春“荷尔蒙”爆发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戏剧矛盾,空泛地转换为一种祖辈与父辈间的博弈,并且凭借着教师对学生天然的统摄力与权威,建构起了他们自身对父辈与祖辈的想象与认同。银幕之外,在“95后”的观众群体眼中,架构了横跨半个世纪故事时间的该片,却成为了一次观摩父辈与祖辈之间家庭伦理关系的历史再现。在影片中,这种跨越代际的认同也具有让“浪子回头”的魔力:混社会的洛小乙一度沉沦后,是苗老师以“爷爷会被你气死”一语咆哮将他唤醒;片末处与女学生安静对视的苗老师的苍老形象,进一步把当下“95后”观众对父辈与祖辈的想象具象化。因之,创作者在片中使安静与洛小乙的父亲都处于缺位状态,就是为了不使“借题发挥”的苗老师与其他相似的角色发生碰撞,同时试图集中笔墨将苗老师的形象塑造得更为凝练与崇高,也与古训中“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价值观念相榫接。一言以蔽之,本片的这种以父辈为主体并向上推行进行怀旧的策略,使其与大多数聚焦于校园故事本身、单纯关注青春回忆的影片区别开来。

当然,如果将其与更广泛意义上的中国青春片相联系,韩寒在《后会无期》与《飞驰人生》中似乎早已达成了父与子之间“弑父”到“释父”的握手言和,《老师·好》至少不是最早的例证,不过它们都构成了中国“老龄化”青春片的第一矩阵。但是,本片中尤为突出的是这种来自父辈的规训,更大程度上连接了认同体制的追求。且看,影片中两个重要的男性人物角色达成“成长”的目标,都是为了获得来自主流价值的肯定:苗老师为再次获得“先进教育工作者”的称号而对学生要求严苛,并因此触发了大多数人的情节冲突,这一目标构成了苗老师人物性格编码的根本要因;洛小乙的角色属性不断地在班集体内外游



离,则是因为入团目标的屡次受挫与最终达成。苗老师获得“先进教育工作者”奖的那辆二八自行车则成为片中学生们与他进行“斗智斗勇”的主要道具之一,而学生对自行车的态度从拆卸(反抗)到悬挂(认同)到寻找(合作)的脉络,恰是他们人物成长线的一次集体勾勒。这样就在剧本容量有限的前提下,赋予了该班级的学生群像与主要人物之间的价值观念共享。在他们把苗老师的自行车找回后,以再现集体主义主流仪式的方式,为自行车挂上红花,唱出“欢迎进行曲”的场景,就是这种对体制认同追求的绝佳体现。

或许由于影片中这种认同追求的向度单一,又或许由于片中的历史追溯对创作者来说过于久远从而导致了脱离其经验,使得某些观念表达稍显陈腐。需知电影的主题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代,都不应脱离时代精神表达的基本原则。《老师·好》的英文片名叫做“Song of Youth”(青春之歌),而上世纪中期崔嵬导演也有一部“同名”的《青春之歌》,它将女学生林道静的感情线与她政治上觉醒并走向救亡之路的心理变化脉络相融合。林道静对于当时的观众来说,也是父辈一代人,恰如本片中的安静之于当下观众。两厢并置比较,就会发现相同主旨之下,《老师·好》中对父辈的解读与认同基本囿于仪式化的嘲弄。片中,在苗老师被人诬陷而遭停职处分后,为了替他证明清白,作为苗老师最为欣赏的学生安静竟然骑着自行车冲进县政府大门上演“击鼓鸣冤”的戏码。不论这一事实发生有可能,这种流传于封建时期的控诉方式,显然与当代法制社会相悖,而且相当程度上割裂了他们面向体制(高考、入团、评先进)的人物动机目标。将历史事件放置于历史语境之中进行阐释或许是历史研究之责,但是罔顾当代的“重返历史”或许不该是文艺创作的应有之义。

颇为遗憾的是,《老师·好》仍旧无非在期待落空、梦想破灭、伤怀过往等几个桥段之间原地打转。该片虽然满足了观众对青春片基本模式的想象与期待,但从更高的创作期许上来说,青春片的“老龄化”应当指向一种对“传统”青春片范式的拓展,而这种拓展不应局限于形式,在价值观念上亦须不断地将历史经验与在地化表达的内在充实其间,这样才有可能为青春片的未来创作提供更加强劲的内在动力。